

# 数字经济与新型全球化： 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分析框架\*

郎 昆<sup>1</sup> 郭美新<sup>1</sup> 龙少波<sup>2</sup>

(1. 清华大学 100084; 2. 重庆大学 400044)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全球经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治理体系失序，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形成。在这场变局中，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导的全球化理论也陷入困境，既无法完全解释近年来的逆全球化趋势，也无法分析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解决方法是提出超越西方知识体系主导的全球化理论。本文在梳理已有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对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逻辑分析和历史案例检验，提出了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全球化发展需要满足三个要素，即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且全球化发展会经历四个阶段，即萌芽期、发展期、巅峰期和衰退期。本文发现，数字经济将引领新型全球化，当前正处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期。未来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潜能能否充分释放，有赖于能否形成公认的国际机制。中国方面应不断完善国内数字经济的治理机制，持续提高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有策略地参与全球数字治理合作。

关键词：数字经济；全球化；生命周期；全球治理；技术革命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3)07-103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3.07.005

## 一、引言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深刻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重塑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sup>①</sup>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

收稿日期：2023-6-8

\*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研究——基于超大经济体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的视角”（批准号：22ZDA029）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郎昆（1995—），男，山西大同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郭美新（通讯作者）（1979—），女，江苏吴县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政府与开放、国际经济学；龙少波（1984—），男，湖南邵阳人，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公共经济与公共政策、金融经济。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EB/OL]. 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1-10/19/content\\_5643653.htm](http://www.gov.cn/xinwen/2021-10/19/content_5643653.htm), 2021-10-19.

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伴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加速创新,全球数据跨境流动量迅猛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2005年至2019年间,全球数据跨境流量增长了98倍,数字贸易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引擎。<sup>①</sup>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经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治理体系失序,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形成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未来全球化走势?这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共同关心的重大话题。

全球化通常指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过程,是一种资本、商品、服务、劳动以及信息超越国内市场和国界进行扩散的现象(戴维·赫尔德,2001)。历史上全球化曾经历了多轮扩张、博弈、萎缩和调整,最近一轮全球化以二战以后联合国成立为开始标志,以冷战结束后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为加速节点,表现为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规模的大幅上升。然而,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全球化陷入了一个停滞甚至倒退期:先是中东战乱引发欧洲难民危机,接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吸引全球关注,再到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和产业链安全焦虑。

在这场全球化的大变局中,传统的全球化理论也陷入困境。围绕如何解释近年来全球化的新变化,国内外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提出了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慢全球化(Slobalization)和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等理论解释。反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跨国企业拿走了大部分的收益,而普通人的利益因此受损,引发了被边缘化的国家和大众的反全球化情绪(斯蒂格利茨,2019;Piketty,2003;Milanovic,2016)。逆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导致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增加了一国应对外部风险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侵蚀了国家主权,引发了政府的逆全球化政策(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2012;阎学通,2020;Hu & Spence,2017)。慢全球化的观点认为全球化时代并没有终结,而是进入一个缓慢的调整期,一旦各国在全球治理框架下达成新的共识,经济全球化依然会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sup>②</sup> 再全球化的观点认为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和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传统的全球化模式需要进行改革重构(王栋、曹德军,2018;Benedikter et al.,2022)。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参考,然而存在以下三点缺陷。第一,忽视了引领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国际公共产品的配套,而引领国家在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后者的能力和意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化的进程。第二,将全球化过度简化为一种经济现象。事实上,全球化在不同时代往往呈现出不同形式,在农耕文明时代表现为人口的全球流动,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商品的跨国贸易,伴随着金融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更多表现为资本和数据的跨境流动。第三,缺乏历史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逆全球化趋势并非近年来的新现象,历史上全球化曾经历了多轮扩张、萎缩和调整,全球化的主要形式和引领国也经历了多次更替,为理解当下的国际形势提供了丰富素材,而已有研究缺乏对历史案例的挖掘分析。

如何理解近年来全球化的新现实?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全球化格局?中国应如何参与构建新型全球化?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Globalization Life Cycle),尝试提供一种解读全球化演进逻辑的新视角。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和总结已有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对全球化理论的研究;第三部分提出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即全球化发展需要满足的三个要素和经历的四个阶段;第四部分使用贸易全球化的演进作为典型案例,检验理论部分的发现;第五部分分析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最后,对中国参与引领新型全球化提出政策建议。

<sup>①</sup> 马建堂:数字化为服务贸易注入强大新动能[EB/OL]. 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109/05/t20210905\_36882150.shtml,2021-9-5.

<sup>②</sup> The Steam Has Gone Out of Globalisation[J/OL]. The Economist,https://www.economist.com/leaders/2019/01/24/the-steam-has-gone-out-of-globalisation.

## 二、文献综述

全球化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对该问题的研究探讨。然而,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研究问题和方法选择上各有侧重。经济学学者们把全球化视为国际分工和产业组织的形式,重视分析各国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政治学学者往往把全球化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经济、文化在全球扩张的表现,着重分析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赖关系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历史学学者则认为全球化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从大历史维度探讨全球化的动力和影响。之所以存在上述差异,主要源自其学者关注的问题不同,但在解释和解决今天全球化所面临的新问题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缺陷。归结起来,围绕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如何演进,学界主要存在三类竞争性解释。

### (一)比较优势的解釋及其不足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产品、服务和要素的全球流动,是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的结果。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证明了贸易可以使双方福利都得到提升,因此各国都应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应主要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并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应主要生产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并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全球化是各国为了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自发参与国际贸易的结果。

比较优势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并主张各国基于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优势”原则展开国际分工,实施国际贸易。随后,大卫·李嘉图(1891)在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间应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拓展了国际贸易理论的适用范围。后续的经济学者如 Heckscher(1919)、Ohlin(1935)、Stolper 和 Samuelson(1941)进一步丰富了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

比较优势理论对于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后续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者将比较优势从单纯的要素禀赋因素扩大到更广的范畴,从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内生性技术进步(Endogenous Growth)等角度解释国际贸易的动机(Krugman, 1979; Dasgupta & Stiglitz, 1988; Rivera-Batiz & Romer, 1991)。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批评。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只能说明短期内贸易可以使双方的福利都得到改善,然而现实中长期来看,如果一味强调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一直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长期处于不利地位,陷入产业结构固化的“比较优势陷阱”(洪银兴, 1997; Chenery, 1979; Lewis, 1980)。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考虑了贸易使整体国家福利上升,却忽略了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即全球化过程中跨国企业拿走了大部分的收益,而普通人的利益因此受损,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斯蒂格利茨, 2019; Piketty, 2003; Milanovic, 2016)。还有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日韩参与全球化的崛起过程,例如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和大众汽车合资生产汽车本身并不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但却促进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李稻葵, 2020; Friedman, 2005; Porter, 2011)。

### (二)制度扩张的解釋及其不足

支持该理论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扩张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主导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不断扩张的倾向,从历史上建立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到今天的全球化,都是经济和军事强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一种形式。根据制度扩张理论,全球化是霸权国家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主导形成的多边经济秩序。

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认为资本主义扩张导致了全球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二战后,拉美的学者提出了“依附理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被划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中心国家生产工业制成品,外围国家则生产初级工业、农业产品,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居支配地位,后者受前者的剥削和控制,并依附于前者发展(Prebisch,1949)。伊曼努尔·沃勒斯坦(2011)的世界体系理论将当今世界体系概括为“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式,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会对“半边缘”和“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以维持自身的优越地位,因此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极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罗伯特·吉尔平(2006)也认为,“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发起的多边经济秩序的副产品”。安东尼·吉登斯(2013)则将全球化视为现代性(Modernity)的各项制度向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过程。其他的学者如阿里夫·德里克(1994)、格雷戈里·阿尔博(1996)、保罗·斯威奇(1997)、莱斯利·斯克莱尔(2001)、威廉·罗宾逊(2004)、弗朗西斯·福山(2014)等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制度扩张理论的阐述。

然而该理论也引发了一些批评争论,主要包含以下几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扩张理论将全球化的过程和结果过度简单化,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不是由某几个中心国家主导,而是由众多主体共同推动的,全球化的结果也并非只是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简单推广,而是众多制度文明的交流共存(费孝通,2005;Huntington,2000)。另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扩张理论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即计算机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的全球流动,对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1998;Castells,1999)。

### (三)文明发展的解释及其不足

历史学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从人类走出非洲,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到今天互联网的发展普及,这种全球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是一直存在的。全球化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尽管偶尔被“巨大的变迁和倒退”打断(戴维·赫尔德,2001)。

大量历史学的研究指出全球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时期。戴维·赫尔德(2001)在《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把全球化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前现代(9000—11000年前)、现代早期(1500—1850年)、现代(1850—1945年)和当代(1945年以后),并阐述了不同阶段全球化的历史演进、时空形态、主要动力和组织机制。纳扬·昌达(2021)在《大流动》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源自人类追求更好更充实生活的基本欲望,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并提出早在 5.5 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走出非洲时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斯塔夫里阿诺斯(1992)在《全球通史》中提出全球化起源于 1500 年,从此以后随着通讯和交通工具的不断发展,世界各地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地区历史开始转变为全球历史。

然而,该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受到了后续研究者的批评。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发展理论将全球化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自发过程,忽视了主导国家和国际机制的角色作用。事实上,在历史上每一次全球化的过程中,都有赖于相关国际机制的形成,如自由贸易制度、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等,而这些国际机制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离不开主导国家的承担和提供(汉斯·马丁·哈拉特·舒曼,1998;Rodrik,2011)。另一种观点认为文明发展理论将全球化视为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线性发展趋势,无法解释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逆全球化成因(佟家栋等,2017;ORourke & Williamson,1999)。

总体来看,迄今为止关于全球化的各种理论都不能完全解释近年来全球化所面临的新问题,都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短板。本文提出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尝试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提供一种解读全球化演进逻辑的新视角。

### 三、理论框架：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

生命周期(Life Cycle)本是生物学的一个概念,指一个生命体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周而复始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后来有学者将这种分析框架应用于政治学和管理学研究,把组织的创立、成长和衰落的过程类比为生物的生命过程,提出了组织生命周期理论(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并发展成组织管理学的一支重要文献(Downs,1967;Quinn & Cameron,1983)。今天,“生命周期”已经被各类研究广泛使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技术生命周期理论(Technology Life Cycle)也被先后提出(Anderson & Zeithaml,1984;Ayres,1988)。

从历史演化来看,全球化经历了多轮扩张、收缩的轮动发展。从周期性的轮动来看,每轮周期经历的时间可能长短不一,全球化的形式也有较大差异:在农耕文明时代表现为人口的全球流动,在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商品的跨国贸易,伴随着金融业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化更多表现为资本和数据的跨境流动。本文提出的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Globalization Life Cycle)力图从长周期视角解读全球化的演进逻辑。

#### (一)全球化发展的三要素

本文将全球化定义为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国家推动下的要素全球流动的过程。基于对全球化发展历程的历史案例梳理,本文发现全球化并不是完全自发产生的,其发展需要满足以下三个要素。

一是技术革命,即重大的技术革命是全球化发展的前提条件。技术革命对全球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重大的技术革命(例如工业革命)往往会拉大国家间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使得要素的跨境流动变得有利可图;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例如航海技术进步)往往会降低交通和运输成本,从而使要素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

二是大国主导,即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大国主导是全球化发展的驱动力量。技术革命造成了国家之间生产力水平的差距,而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大国具有极强的激励来推动要素的全球流动,以充分发挥技术优势,抢占全球市场并提升本国福利。主导国家的这种利己行为,客观上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驱动力量。

三是国际机制,即形成国际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是全球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技术革命和主导国家分别为要素全球流动创造了条件和动力,但在此过程中也会出现各国政策不协调、信息不对称、风险外溢等外部性问题,阻碍着全球化的推进。这就有赖于形成相应的国际机制以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外部性问题,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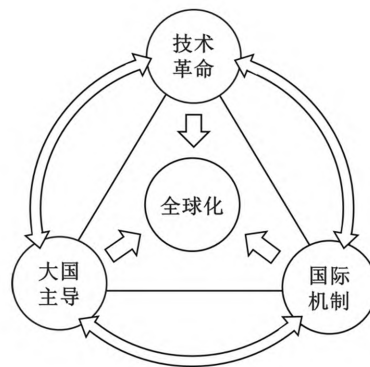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化发展的三要素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下同。

## (二) 全球化发展的四阶段

根据上文对全球化的定义与要素分析,结合对全球化演进的历史梳理,本文提出了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每一轮全球化发展都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萌芽期。该阶段的标志是重大技术革命的出现,如航海技术进步、工业革命、金融业的兴起、信息技术革命等。这些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主要国家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竞争。这一阶段为全球化创造了初始条件。

二是发展期。该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伴随着各国技术水平差距的增加,技术占优势的大国会主动推动要素的全球流动。由于主导国家掌握着核心的生产力,对其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关键要素的聚集和海外市场的拓展,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推动全球化需要付出的成本。这一阶段,在主导国家的推动下全球化初步发展。

三是巅峰期。该阶段的标志是相关领域国际机制的形成,例如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WTO 成立等。在这些国际机制形成之前,全球化往往是由部分技术领先大国单向推动的,由于在国际社会中缺乏具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各国参与过程中会产生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外部性问题,阻碍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而国际机制的形成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促进国家间的协调合作,让全球化从之前的无序发展,进入到有序快速发展阶段。

四是衰退期。全球化并非是一个线性的自发过程,其发展要同时满足三个要素,即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缺失都会导致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可能是由于全球化过程中的技术扩散效应,导致了各国之间的技术趋同,使得关键要素跨境流动的必要性下降;可能因为主要参与国家国内社会经济矛盾频发,导致其政府内顾不暇,不愿意继续为全球化买单;也可能是因为既有的国际机制老化,无法有效解决全球化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上述的种种原因都会导致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

综上所述,全球化本质是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国家推动下的要素全球流动过程。从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到金融创新,历史上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催生了全球化浪潮,尽管全球化的形式和演进过程各异,但每一轮全球化都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巅峰期、衰退期。具体来说:首先,新技术革命出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各国技术竞争,为全球化创造了条件。接着,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大国为了提高本国福利,会主导推动要素的全球流动,全球化进入了初步的无序发展阶段。而后,伴随着相关领域国际机制的建立,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得到解决,使全球化真正进入一个有序快速发展的巅峰期。最后,由于各国技术趋同或国际机制失灵等原因,全球化的三个要素不再完全满足,导致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本文称之为“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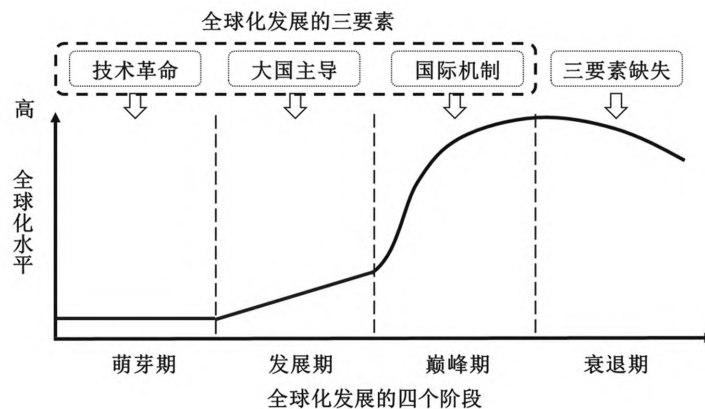


图 2 全球化发展的四阶段示意图

#### 四、历史案例检验：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本文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选择工业革命至今贸易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案例,进一步检验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有效性。

首先,诞生于 18 世纪 60 年代的工业革命极大提高了英国的生产效率,也标志着贸易全球化进入了萌芽期。贸易全球化起源于工业革命,尽管工业革命前世界经济也存在着重要的贸易联系,但这些贸易活动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各国生产活动区域化、本地化的特征。一方面,贸易的体量与产品种类有限,对外贸易并未成为各国生产能力提升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原材料等要素并未大规模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没有形成全球性的生产体系。1776 年瓦特改良了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开端,此后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更是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据统计,到 1850 年英国的工业总产值已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钢铁产量占世界的二分之一,煤产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二(Clark, 2008)。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发明(如火车、蒸汽船等)及其引发的科技与社会变革也都源自英国。基于产业优势,英国凭借全球贸易的渠道向世界大量出口纺织品、煤、铁、机械制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因此,工业革命促进了英国的技术进步,拉大了同其他国家的生产效率差距,为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初始条件,标志着贸易全球化进入了萌芽期。

其次,自 19 世纪中叶起,掌握了技术领先优势的英国和美国先后主导推动了自由贸易政策,全球化进入发展期。1840 年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掌握了技术先发优势,在此背景下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最早的自由贸易政策,甚至不惜使用战争等极端方式打开海外市场。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形成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广泛共识,正如 19 世纪中期英国的“反谷物法同盟”所指出的“自由贸易原则是将外国变为我们宝贵殖民地极好的方式,而我们也不必负担统治他们的责任”(Semmel, 2004)。这种共识很快就转化为英国政府的具体政策:先是于 1846 年废止了《谷物条例》,不再征收保护性的农产品进口关税;1849 年又终止了《航海法案》,殖民地货物不再只能由英国船只装运,放弃了对殖民地的垄断贸易;1860 年前后开始同法国等国进行协商,逐步取消贸易与关税限制(张本英, 2009)。这一时期英国平均关税税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见图 3)。在英国的主导推动下,贸易全球化不断深化,全球出口额占 GDP 比重从 1846 年的 4.5% 上升为 1916 年的 14.8%(Federico & Junguito, 2016)。然而,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英国在技术上的绝对领先地位逐步丧失,面临着来自美国、德国等国家的赶超压力。到 1913 年,英国的机器生产量在全球总份额中的比重已经不足 1/8,而美国则占 1/2 以上,德国占 1/5(韩青等, 2011)。在此背景下,美国接替英国成为贸易全球化的主导国,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再次,20 世纪中叶,在美国的主导下,形成了一系列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机制,极大推动了国家间协调合作和商品跨境流动,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巅峰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接替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霸主,并主导建立了战后的全球治理体系。在美国的推动下,1947 年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多边贸易体制的条约文件《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贸易全球化领域的国际机制正式形成。从 1947 年到 1994 年,关贸总协定共主持了 8 轮多边贸易谈判,谈判方从最初的 23 个增加至 123 个,谈判范围也逐渐从关税扩大到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等领域,谈判成果不断积累,相关国际机制日趋完备(余敏友, 2003)。这些国际机制的形成有效解决了全球化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促进了国家间协调合作,使全球化从之前的单边推动、无序发展阶段,进入到多边共建的有序快速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全球关税税率大幅下降,跨境贸易迅速发展,全球

贸易额从 1950 年的 630 亿美元上升到了 2008 年的 16 万亿美元。<sup>①</sup> 特别是自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全球贸易额长期保持着 5% 以上的年平均增速,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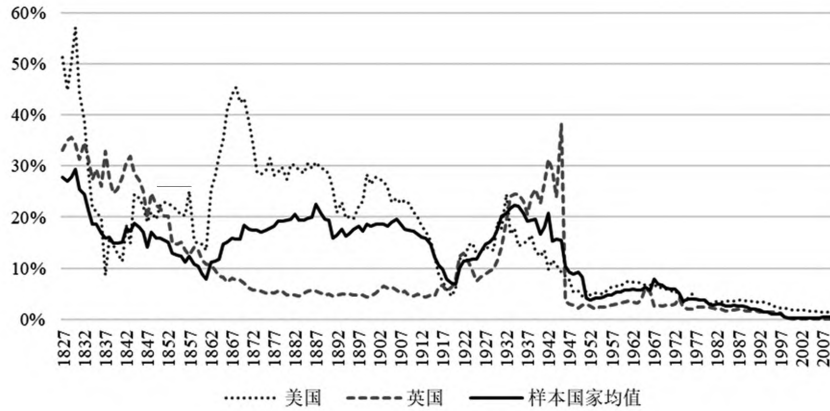


图 3 1820—2010 年主要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

数据来源:Clemens M A, Williamson J G. Why did the Tariff-growth Correlation Change After 1950?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4, 9: 5—46; Fouquin M, Hugot J. Two Centuries of Bilateral Trade and Gravity Data: 1827—2014[R]. Universidad Javeriana-Bogotá; 20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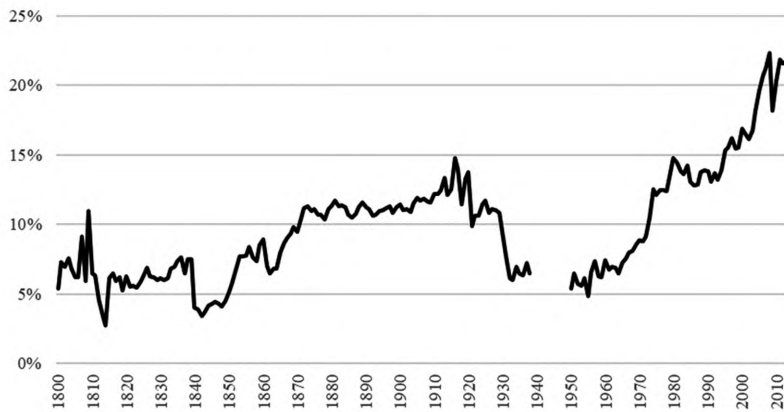


图 4 1800—2014 年全球出口额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Federico G, Tena Junguito A. World Trade, 1800—1938: A New Data-set[R]. Universidad Carlos III de Madrid. Instituto Figuerola, 2016.

最后,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转折点,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衰退期。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贸易格局,美国作为二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国,其领导能力和意愿下降,开始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都被卷入一张复杂相互依赖的网络中,导致了各国经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上升,催生出供应链安全、政策协调等新问题,而既有的国际机制无法有效回应这些新问题。上述原因均导致了 2008 年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停滞甚至衰退期:先是中东战乱引发欧洲难民危机,接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吸引全球关注,再到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引发全球供应链震荡和产业链安全焦虑。在此背景下,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停滞甚至衰退期,全球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占 GDP 比重也从 2008

<sup>①</sup> Evolution of Trade Under the WTO; Handy Statistics[EB/OL]. WTO website,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trade\\_evolution\\_e/evolution\\_trade\\_wto\\_e.htm](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trade_evolution_e/evolution_trade_wto_e.htm).



年的 31.0% 下降至 2020 年的 26.5%。<sup>①</sup>

综上所述,18 世纪后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完美地对应了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的四个阶段。以 1776 年瓦特改良蒸汽机为标志性开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了国家间的技术竞争和生产效率差距的扩大,为贸易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初始条件,该阶段是贸易全球化的萌芽期。直至 19 世纪中叶,掌握当时核心技术优势的英国开始降低进口壁垒,主动开放国内市场,并依托其殖民地体系推动商品和原材料的跨境自由流动。进入 20 世纪,美国逐渐接替英国成为了全球经济和技术的主导国,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放弃了长期奉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着手推动贸易全球化。这一阶段,在英国和美国的先后推动下,贸易全球化进入一个发展期。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际社会中也出现了各国政策不协调、风险外溢等外部性问题,阻碍着全球化的推进。为解决这些问题,二战后的美国积极推动相关领域国际机制的形成:在贸易领域协调各国签署《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在金融领域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些国际机制的形成极大促进了国家间协调合作和商品跨境流动,贸易全球化进入到一个迅速发展的巅峰期。然而,以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转折点,贸易全球化发展面临系列挑战,具体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各国工业生产技术差距缩小,主导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激励不再,传统经济增长动能衰减,全球治理体系失序等。上述种种原因使得全球化发展的三要素(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国际机制)不再同时满足,导致了近年来贸易全球化进入衰退期。

## 五、数字经济对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通常来说,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sup>②</sup>。近年来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并且在重塑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经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治理体系失序,逆全球化趋势加速形成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将如何影响未来全球化走势?这是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共同关心的重大话题。本文从全球化生命周期理论出发,基于全球化发展所需满足的三个要素,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应。

### (一)要素一基本满足

从全球化的第一要素(技术革命)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具备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一方面,当前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最显著的新经济增长极,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的的方式,也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1 年全球数字经济总规模 38.1 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数字经济总规模 7.1 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sup>③</sup> 在美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已超过金融保险业,成为国民经济第四大产业(Nicholson,2020)。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间里,不论是中国还是全球,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将持续上升,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 2022 年 1 月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目标,“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sup>①</sup> Exports of goods and services (% of GDP)[EB/OL]. World Bank website,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

<sup>②</sup>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EB/OL]. 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http://www.stats.gov.cn/tjgz/tzgb/202106/t20210603_1818129.html), 2021-6-3.

<sup>③</sup>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EB/OL].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 2022-12.

10%”，据测算，2020 年底这一比重为 7.8%（鲜祖德、王天琪，2022）。<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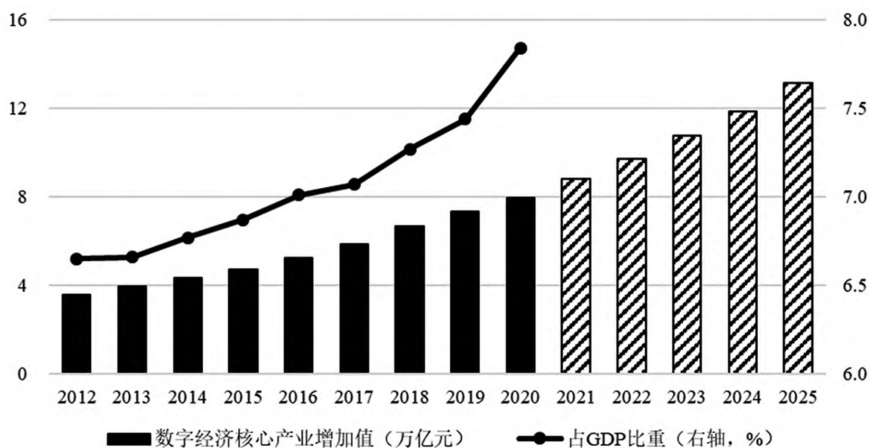


图 5 2012—2025 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及其占 GDP 比重

数据来源：鲜祖德，王天琪.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J]. 统计研究，2022，39(01):4-14.

注：数据截至 2020 年，由于 2021、2022 年数据迟滞，故 2021—2025 年数据为预测值。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服从梅特卡夫法则、达维多定律和摩尔定律，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近年来全球数据跨境流动量迅猛增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2005 年至 2019 年，全球数据跨境流量增长了 98 倍。<sup>②</sup>与此同时，数据的全球化属性、资产属性以及流动属性日益增强，种种迹象表明数字经济极有可能引领新一轮全球化，以至于 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主题就定为“全球化 4.0”。

## （二）要素二部分满足

从全球化的第二要素（大国主导）来看，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部分掌握核心算法算力的国家正在积极推动数据全球流动，数字全球化正处于发展期。一方面，数据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个体数据价值很低，只有成千上万条数据整合在一起、经过开发挖掘后才能产生巨大的价值，且数据收集、储存、分析和加工的过程要付出大量初始沉没成本，而一旦算法系统建立起来，则多处理一条数据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这就导致了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要素，算法算力成为了核心技术，掌握核心优势的国家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导国。当前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各国围绕数字基础设施、算法创新、创业应用和数字治理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美国和中国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处于主导地位，两国目前占有全球 75% 的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70% 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员、50% 的全球物联网支出、75% 的云计算市场。在全球 70 家最大数字平台公司中，七个“超级平台”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二，以规模排序依次是微软、苹果、亚马逊、谷歌、脸书、腾讯和阿里巴巴。<sup>③</sup>

另一方面，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数据已不再单纯是隐私或私有财产，已经成为国家、数据

<sup>①</sup>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EB/OL]. 国务院网站,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 2022-1-12.

<sup>②</sup> 马建堂：数字化为服务贸易注入强大新动能[EB/OL]. 中国经济网,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109/05/t20210905\\_36882150.shtml](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109/05/t20210905_36882150.shtml), 2021-9-5.

<sup>③</sup> 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EB/OL].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ch.pdf](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ch.pdf), 2021-8-30.

企业和个人共享的信息资产,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如何在保护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全球数据的互联互通、开放共享,是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的关键。因此,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国家有极大激励推动数据全球自由流动,以提高生产力,扩大全球市场份额。事实上,美国作为当前在数字技术领域具备相对领先优势的国家,长期致力于通过多边、双边、单边途径,倡导全球数据开放流动,强调商业和消费自由。2018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即《云法案》(CLOUD Act),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授予本国企业广泛的数据使用权。<sup>①</sup> 2019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了《联邦数据战略与2020年行动计划》(Federal Data Strategy & 2020 Action Plan),正式提出要把数据作为战略资产加以利用,并制定了未来十年的愿景目标。<sup>②</sup> 此外,美国还通过 TPP、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等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数据自由跨境流动,并反对数据本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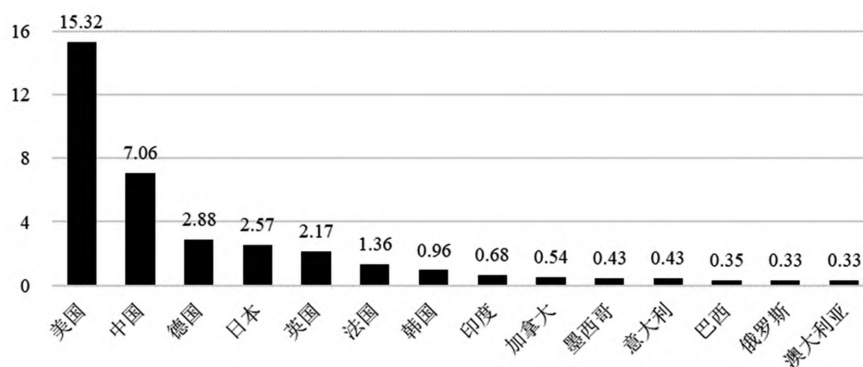


图 6 2021 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万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 年)[EB/OL].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 2022-12.

然而,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格局仍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中,数字全球化的主导国家尚未完全确立。事实上,除美国外,同为数字经济重要参与者的中国和欧盟,也在积极推动数字全球化进程,并相继提出了各自的治理方案:中国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主张数据有限的流动;欧盟则强调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倡导数据有条件的流动。

### (三)要素三尚未满足

从全球化的第三要素(国际机制)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在该领域的国际机制尚未形成。一方面,数字经济本质是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这增加了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需要加强监管治理。与传统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相比,数字经济有更强的知识技术门槛,且最终产品与服务具有非实体化特征,客观上会导致并加剧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这就使得消费者的利益更加容易受到损害,对相关行业的监管和治理不可或缺。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交易流通成本,增加了监管治理难度,尤其需要全球协调合作。由于数字经济的产品和服务非实体化,使得交易本身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跨地区、跨国家交易

<sup>①</sup> H. R. 1625-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18[EB/OL].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1625>.

<sup>②</sup> Final Federal Data Strategy & 2020 Action Plan[EB/OL]. Federal Data Strategy, <https://strategy.data.gov/assets/docs/2020-federal-data-strategy-action-plan.pdf>.

可以通过互联网高频率、低成本完成,增加了对相关行业的监管难度和治理成本。同时,数字经济领域的治理对象常常是跨国垄断企业或社群,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治理能力与效果有限,且往往具有外溢性,尤其需要治理领域的全球协调合作。

目前在数字经济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由于主要参与国家在监管理念和立场方面的分歧,导致形成了多边治理进展缓慢、双边和区域性合作碎片化、美中欧倡导三足鼎立的局面。在数据开放、数据资产管理、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共享交易安全领域亟待产生统一的国际规则。

总的来说,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具备引领新一轮全球化的条件。而当前正处于数字全球化的发展期,中美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在技术领域竞争主导权,在治理领域提出各自倡导。未来数字经济的全球化潜能能否充分释放,有赖于能否形成公认的国际机制。有理由相信,给定全球化的三个要素,即技术革命、大国主导和国际机制同时满足,数字经济必将释放出巨大能量,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在此背景下,中国方面应积极参与,做好应对准备。

## 六、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发现,对中国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参与数字全球化治理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中国的数字经济仍处于发展赶超期,需要持续提高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数字经济将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而数字全球化的过程将由在数字领域掌握核心技术优势的国家主导推动。当前中国的数字经济仍处在发展和赶超阶段。从数字经济的绝对规模来看,根据中国通信研究院测算,2021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比重为40%,中国为19%,仍有一定差距<sup>①</sup>;从技术水平来看,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数字领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大幅上升,但美国仍在不少领域处于领跑地位;从国际化程度来看,虽然以腾讯、阿里巴巴、美团、滴滴等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国际程度上同谷歌、脸书、亚马逊相比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因此,建议持续做大做优做强中国数字经济,提高有关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在此过程中,必须充分调动相关的平台企业、行业协会、科研群体的积极性,由政府与市场共同发力,背靠中国大市场,用好国内国际双循环,提高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优势,持续提升中国数字经济的全球竞争力。

第二,倡导全球治理的前提是完备的国内治理机制,要持续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数字经济监管是一个全球性难题,中国拥有海量的用户数据,有高效的政府部门,有国际领先的数字经济企业,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程师群体,为探索数字经济的监管模式提供了独特优势。长期以来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监管力量相对不足,一方面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无序竞争、垄断等一系列问题,亟需建立一个促进数字产业长期健康发展和合理监管的体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sup>②</sup>建议以组建国家数据局为契机,认真研究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个目标,持续提高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和监管效率,探索数字经

<sup>①</sup>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R].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t20221207_412453.htm), 2022-12.

<sup>②</sup> 习近平.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N]. 人民日报, 2022-1-16(1).

济发展与监管的中国方案。

第三,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当前由于主要参与国家在监管理念和立场方面的分歧,在数据开放、数据资产管理、数据安全保护和数据共享交易安全领域存在较为严重的治理赤字,亟待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sup>①</sup>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的落地实行。在议题设置上,建议学习《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模块式谈判方法,保障灵活性,争取大多数,先易后难推进相关领域治理合作。除此之外,必须认识到在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都是重要主体。在国际谈判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更好调动起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形成国内共识,就特定的议题针对特定的国家形成战略合力。□

参考文献:

1. 戴维·赫尔德等. 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 杨雪冬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 斯蒂格利茨. 全球化逆潮[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3.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 阎学通. 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J]. 国际政治科学,2020,5(03):4-7.
5. 王栋,曹德军. 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6. 亚当·斯密. 国富论(下)[M]. 郭大力,王亚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7. 洪银兴.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 经济研究,1997(06):20-26.
8. 李稻葵. 中国的经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学总结[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 费孝通.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上)[J]. 群言,2005(01):17-20.
12. 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 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3. 纳扬·昌达. 大流动[M]. 顾捷昕,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21.
14.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M]. 吴象婴,梁赤民,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5. 汉斯·马丁,哈拉尔特·舒曼. 全球化陷阱[M]. 张世鹏,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6. 佟家栋,谢丹阳,包群,黄群慧,李向阳,刘志彪,金碚,余淼杰,王孝松. “逆全球化”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笔谈[J]. 中国工业经济,2017(06):5-59.
17. 张本英. 自由帝国的建立:1815—1870年英帝国研究[M]. 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18. 韩青,高先民,张凯华. 贸易战争:500年全球贸易进化史[M]. 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
19. 余敏友. 论关贸总协定的历史地位与作用[J]. 武大国际法评论,2003,1(00):1-31.
20. 鲜祖德,王天琪.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J]. 统计研究,2022,39(01):4-14.
21. Piketty T, Saez E.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

<sup>①</sup> 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EB/OL]. 求是网,2022-11-9, [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1/09/c\\_1129113635.htm](http://www.qstheory.cn/yaowen/2022-11/09/c_1129113635.htm)

nomics, 2003, 118(1): 1—41.

22. Milanovic B. *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 Hu F, Spence M. *Why Globalization Stalled; An How to Restart It*[J]. *Foreign Aff.*, 2017, 96: 54.

24. Benedikter R, Gruber M, Kofler I. *Re-globalization: New Frontiers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Globalization*[M]. Routledge, 2022.

25. Ricardo D. *From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M]. G. Bell and sons, 1891.

26. Heckscher E F. *The Effect of Foreign Trad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M]. *Ekonomisk Tidskrift*, 1919.

27. 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28. Stolper W F, Samuelson P A. *Protection and Real Wag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41, 9(1): 58—73.

29. Krugman P R.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79, 9(4): 469—479.

30. Dasgupta P, Stiglitz J. *Learning-by-do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and Trade Policies*[J].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8, 40(2): 246—268.

31. Rivera-Batiz L A, Romer P M.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531—555.

32. Chenery H B.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5, 65(2): 310—316.

33. Lewis W A. *The Slowing Down of the Engine of Growth*[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4): 555—564.

34. 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M].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35. Friedman T L. *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Macmillan, 2005.

36. Prebisch 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R]. Naciones Unidas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1949.

37.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38.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0[J]. John Wiley & Sons, 2013.

39. Fukuyama F.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M]. Macmillan, 2014.

40. Dirlik A.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M].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41. Robinson W I. *A Theory of Global Capitalism: Production, Class, and State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M]. JHU Press, 2004.

42. Sklair L.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M]. Oxford: Blackwell, 2001.

43. Albo G. *The World Economy, Market Imperatives and Alternatives*[J]. *Monthly Review*, 1996, 48: 6—22.

44. Sweezy P M. *More (or less) on Globalization*[J]. *Monthly Review*, 1997, 49(4): 1—5.

45. Huntington S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M]. Palgrave Macmillan US, 2000.

46. Castells 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M]. Geneva: UNRISD, 1999.

47. Rodrik D.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M]. WW Norton & Company, 2011.

48. ORourke K H, Williamson J G.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M]. MIT press, 1999.

49. Downs A. *Inside Bureaucracy*[M].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50. Quinn R E, Cameron K.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s and Shifting Criteria of Effectiveness: Some Preliminary Evidence[J]. Management Science, 1983, 29(1): 33—51.
51. Anderson C R, Zeithaml C P. Stage of the Product Life Cycle, Business Strategy,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4, 27(1): 5—24.
52. Ayres R U. Barriers and Breakthroughs: An “Expanding Frontiers” Model of the Technology-industry Life Cycle[J]. Technovation, 1988, 7(2): 87—115.
53. Clark G. A Farewell to Alms: A Brief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orld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54. Semmel B.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the Empire of Free Trade and Imperialism 1750—1850[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8.
55. Federico G, Tena Junguito A. World Trade, 1800—1938: A New Data-set[R]. EHES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 History, 2016.
56. Nicholson J R. New Digital Economy Estimates[J].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20, 2.

## **Digital Economy and Globalization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Globalization Life Cycle Theory**

LANG Kun<sup>1</sup> GUO Mei-xin<sup>1</sup> LONG Shao-bo<sup>2</sup>

(1. Tsinghua University 100084; 2. Chongqing University 400044)

**Abstract :** The world today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On the one h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fe; on the other h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is out of order and the trend of de-globalization is accelerating. In this context,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dominated by Western knowledge system is also in a dilemma, which can neither fully explain the trend of de-globalization nor analyze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globaliza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in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life cycle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case study.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needs to meet three conditions, namely,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leadership of major powers and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will go through four stages, namely, budding, development, peak and declin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will lead a new 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is currently in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China shoul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domestic governanc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hance its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strategically participate in global digital governance.

**Keywords :** Digital Economy; Globalization; Life Cycle; Global Governanc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